

中国跨世纪诗丛



新诗审美人格论

蒋登科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新诗审美人格论

蒋 登 科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中国跨世纪诗丛

蒋登科 主编

新诗审美人格论

蒋登科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建新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5.5印张 11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3-1249-0/I·230

定价：2.50元

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跨世纪诗丛》总序

吕 进

走到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只剩下了八年的路程。对于人生，八年意味着许多欢快与伤感，意味着许多新的回忆与怀恋；对于诗，八年却是一个未知数——也许它带来一次大转折，也许它似缓缓流动的河水。

我不会算命，尽管时下算命是个很走红的职业；甚至在西方国家的大街上都摆着电脑算命的小摊。但是，当我展望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时候，我抱着热切的期许与厚望。

需要有跨世纪的思考。因此，这套由蒋登科主编、共有二十本之多的《中国跨世纪诗丛》可以说是领时代之先的。

要背着更丰厚的行囊走到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中国新诗就有不少事情要作。择其大端而言，我想，无非就是东西南北的问题。

所谓“东西”，就是恰切地处理中国新诗与外国（主要是西方）诗歌的关系。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都清楚，中国文学和中国诗歌的跨入现代行列，和外国（主要是西方）的影响分不开。这并不是一个爱国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有无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这是历史。从诗到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在初期都是以翻译为前导。翻译开路，创作登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西方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可以说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然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确乎是一个重要原因。世界日益变小，如同人类的心灵日益变大。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尤其是在当代，各国诗歌的交流与交融，肯定有助于各国诗歌的发展。封闭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新诗在自己的不同发展阶段，曾先后主要地接受过美国和印度、英国、法国、前苏联的影响，这些影响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营养，在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何其芳、郭小川这些大诗人身上都不难发现这种营养。

但是我的“东西”说还有另一层内涵，这就是外国（主要是西方）影响的本土化。有的新潮诗人不赞成“本土化”的说法，似乎这是一种经不住推敲的浅薄之谈。但是他们迄今并没有能够拿出令我“幡然悔悟”的理由，所以，我也就不准备修改或者放弃自己的观点。借鉴不是膜拜。害怕吃牛肉是有害的，而吃了牛肉就学牛叫却是可笑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诗歌。“诗者，持也”。

诗是十分心灵化的艺术。离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诗歌传统，就无以谈诗。他民族的诗歌形式是无法租用的，世界诗歌在当代呈现出的一体化倾向，丝毫不是以取消各民族诗歌的民族风格为目标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新诗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而西方文学影响的本土化转换则是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之一。伟大的中国新诗作品一定是诗人在非常广阔的艺术视野中的艺术创造。同时，伟大的中国新诗作品一定带着中国土壤的泥土味，一定是中国诗歌的古老积累的现代化呈现。

所谓“南北”，就是注意把握中国诗歌的两立式构架。中华民族是古老的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迄今约四千年的商代，而口吟的诗歌比文字出现更早。在远古的商周文化基础上产生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南北两大渊源。在南方，是以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在北方，是以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就文学而言，南方文学重主观、重抒情、重艺术之美，风格多轻柔细腻；北方文学重客观、重纪实、重叙述之真，风格多豪放粗犷。就诗歌而言，南方的《楚辞》绚烂的浪漫风采与北方的《诗经》朴实的现实谱调形成的两立式构架是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

在中国新诗中，也许南北对峙不十分明显。（当然，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已空前缩短，不过人文地理因素对中国新诗的作用并不

可能完全消失。)但是,中国新诗的两立式构架仍然值得重视。当代的“南北”表现在外向的诗与内向的诗的并存,干预社会的诗与干预心灵的诗的共处,明朗宏亮与低声细语交织,平易朴实与朦胧玄奥对望。在艺术表现和艺术风格上的“大一统”思想,是违背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有害见解。应该在“双为”的前提下,让一切小草竞长,让一切鲜花竞芳,让一切声音竞放。

我们希望二十世纪的最后八年成为中国新诗新的辉煌,诚然有许多诗外因素的冲击与制约。例如,日益浓厚的商品化社会与诗的隔膜,日益变化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对诗的疏远,影视文化日益强大的对诗的挑战,等等。但是,就诗自身而言,这个“东西南北”问题是个中心环节。在猴年春节期问,我对这个问题想得较多。现在写出来,权作《中国跨世纪诗丛》的总序吧!

预祝二十位诗人带着更多的集子走向下一世纪。

壬申年正月十一 于重庆

目 录

吕 进/跨世纪的展望

——《中国跨世纪诗丛》总序……(1)

人格精神的诗学阐释

回顾与展望：新诗，又一个转折点……	(1)
诗人素质与诗歌创造……	(7)
论诗人的文体自觉性……	(21)
纪实：诗的克星……	(31)
诗人的现实人格与诗的审美人格……	(36)
诗人的人格建设……	(51)
诗人的道德……	(58)
诗人：面对冲突……	(62)
新诗坛：久分必合……	(72)
新诗：面对跨世纪的挑战……	(80)

人格精神的诗美表现

无私的爱

——艾青诗作谈片……………(94)

寻梦的历程

——论杨山的诗歌创作……………(101)

评而不评的追求

——论吴明兴的诗歌创作……………(112)

渲染那份淡淡的忧愁

——论梦如的诗歌创作……………(123)

含泪与春同行

——论雪柔的诗歌创作……………(133)

重现生命的价值

——评《西天最后一块净土》……………(143)

偶然获得的必然思考

——《新诗审美人格论》跋……………(152)

回顾与展望：新诗，又一个转折点

几十年来，中国新诗的探索之路的确是太曲折了，时而繁荣，时而沉寂；时而重视诗人的内心感受，时而又把诗歌艺术规律抛诸脑后。这些现象都证明：中国新诗尚未找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应该说，对新诗道路的探索是在新时期才进入高潮的。从“朦胧诗”开始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中国新诗以十年“断裂”为背景，突击走完了西方诗歌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完成的探索之路。“突击”不免带来失误，但就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以为，新时期诗歌首先是完成了诗人与诗品的独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艺术创革。

诗人的个性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完全扭曲了，许多人忘记了艺术，忘记了艺术家的职责和生命，充当了“号手”也便充当了时代的牺牲品。一批异化了的“非人”的人造就了一批非诗的“诗”。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中国诗歌（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的悲剧。

从艾青等老一辈诗人的“归来”和“朦胧诗”的出现开始，中国新诗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观。诗人们首先向往和表现的就是获得独立，消除奴性，摆脱诗歌的非艺术“指挥棒”，创造真正的诗。因此，他们反思过去实质上是对人性和个性的寻求与张扬，他们要从被异化的人性和被扭曲的个性中站立起来。在今天看来，那一代诗人仍然是伟大的，他们的歌声是时代的呼喊，他们走过的道路是从非诗向诗的跨跃，是从虚假的人性向真实的人性的跨跃。

朦胧诗人是时代的悲剧的产物，但他们又是诗歌艺术的幸运儿，在他们身上，“国家不幸诗人幸”的古训体现得十分真切。对社会的反思造就了诗的内涵，从痛苦中走过来的诗人对此看得最深刻，在他们背后，“断裂”的时代的大背景异常清晰，因此，我说，“朦胧诗”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新时期早期诗歌的最高峰。

“朦胧诗”之后，一批诗人试图对诗中的非艺术因素进行进一步的清洗，并对“朦胧诗”本身也进行反思与解剖。他们认为，诗应立足于艺术本身，立足于诗人的心灵感受又超越这种感受。于是他们便从“朦胧诗”对社会的反思走向对个体人生的反思。他们发现，在整个时代的大潮中，人类十分渺小，诗人也丧失了自己的“救世主”地位，因

此，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主要是反崇高，反英雄，甚至反一切现存文化的倾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少人搬用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思想，甚至图解西方的一些现代哲学思潮，使整个诗坛呈现出离散状态，没有先锋，也没有主潮，但流派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在现代环境中，人们的思维一反过去的单一、封闭的线性思维，人的情感也呈现为一种多层面的现代情感。为此，“朦胧诗”之后的许多诗人便试图打破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传统对应关系，重新建构新的艺术体系，以展示现代人的情感领域，从他们的艰难探索之中可以看出，他们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途径是对传统诗歌媒介的重新选择和建构。

语言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的间接性和指示性，“朦胧诗”之后的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力求打破这一既定特征，强调它的表现性，使语言进入直接的、表意的领域，尽可能忘记它本身的含义，而赋予它新的内涵。对媒介的这种重构必然造成传统客体的变形。

我们应该说，任何艺术都具有使客体因主体情感而变形的特征。但这些诗人的媒介重构造成的变形与传统的艺术变形有很大的差别。它不是立足于大众心理和传统审美理想的发展趋向，而是立足于个体心理，立足于对传统审美理想的反动。因此，它必然要在现存艺术之中造成“混乱”，“混乱”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它有时候恰好是艺术审美思

想、艺术价值观念变更的必然表现，是新的艺术体系形成的先兆。但是，就“朦胧诗”之后的一些诗人的创作而言，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问题主要在于，这些诗人的创作显现出了一种令人心忧的现象，那就是把诗歌艺术的探索推向极端，主要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感情的极端个体化。

本来，感情都是个人的，诗歌所抒发的感情也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但是，一个人是不能绝对独立于他人的，他的感情也不可能绝对独立于他人。真正的好诗都不是在个人的圈子内游荡，它要抒发个体情感与群体情感的不同，同时，他也要寻求个体情感与群体情感之间的沟通。有成就的诗人所进行的探索都是建立在文体自觉性与时代自觉性、民族自觉性和读者意识的相互联结的基础上的。“朦胧诗”之后的一些诗人寻求个性的独立，对个体人生进行反思，实质上是“朦胧诗”思潮的一种延续，但是，他们的独立似乎是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绝对隔离，形成人与诗歌之间的绝对隔离，他们追求的独立完全忽略了独立只能建立在时代、传统、读者的制约之中这一基本前提。绝对的个体化只能把诗歌艺术的探索推向死胡同。绝对的独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人和艺术都是如此。

其二，媒介的极端个体化。

许多诗人发现了传统语言媒介的局限性，并想在创作实践中予以打破，创造新的具有个性特色的

“诗家语”，以适应现代人的情绪、情感的抒发，这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一些诗人不是以传统语言媒介为基础进行探索，而是要创造“新语言”。他们全盘否定了传统媒介，使语言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变成了纯个体的东西，因而把他们的探索推向了诗的神秘主义和不可解读的极致。说句不客气的话，读这一类诗就好象不懂外语的人欣赏外语诗歌一样，只知道文字是什么，而不知其中之所云。这样下去，世界上又会出现成千上万种“新语言”，而每一种语言只有一个读者和一个使用者。如果反传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也就必须回到原来的起点。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极端个体化的情感和极端个体化的媒介是互为因果的，前者只能用后者才能标示，后者也只能用前者作为挡箭牌。究其实质，这种作法是对“朦胧诗”的庸俗的发展，有人称这一代诗人为“后朦胧诗人”，我想是有道理的。他们只是在寻求自娱，进行自我消费。当他们把探索推向极端的时候，“玩文学”、“玩诗歌”也便没有出路了。

李延国在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新的活跃往往孕育着新的板结……新的崛起孕育着新的压迫，新的冲击带来新的迷惑。”在中国当前的诗坛上，我们也看到了“新的板结”、“新的压迫”、“新的迷惑”，这是诗歌艺术在自身调节和探索过程之中显现出来的新的困

顿。极端，意味着“死角”，意味着中国新诗必须转向，进入新的探索时期。

对于这个方向，我们暂时不必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新诗应该寻求个体情感与大众情感的交叉，寻求现代语言媒介与传统语言媒介的衔接，并在中国诗歌传统与世界诗歌传统的坐标系中给自己定位。只有这样，中国新诗才能既立足于中国，又走向世界。

1988年11月17日于西南师大

中国新诗研究所

诗人素质与诗歌创造

人们谈论诗歌，总喜欢从文本出发，这当然是无懈可击的，诗歌作品是诗坛现状最直接、最本质的体现，诗歌探索与创新的最终成就也体现在文本上。但是，诗歌文本仅仅是诗人创造的结果，研究诗坛现状，我们还应该研究产生作品的各种动因，即一切与诗歌创造有关的因素。

诗人的素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观照点。

诗人素质的构成十分复杂，主要地应该包括诗人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生活修养等因素，它是体现于诗人身上的一个多位一体的心理、艺术建构。诗人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它决定着诗人的艺术感受力与艺术创造力，影响诗歌探索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创作，诗人的素质又间接地体现在诗歌作品上，决定作品的质量。各个个体诗人的创作共同构成整个诗坛的风貌，诗坛现状便由此而生。

因此，从诗人的素质到诗歌文本（文本构成诗

坛现状)是一个运动的过程。过程,往往包含着比结果更丰富的内涵。探索诗人的素质与诗坛现状的关系,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诗坛现状的来龙去脉,了解它形成的心理的、艺术的过程,有利于比较准确地把握整个诗坛潜存的创造实力以及存在的问题,以便我们对符合诗歌艺术规律的追求加以褒扬与扶持,对背弃诗歌艺术规律的动向加以调整。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新诗发展的动态和流向,使新诗始终沿着稳健的艺术轨道向前发展。

对于诗人素质与诗歌创作的独特关系,已有过不少阐述,吕进先生在《写诗与读书》一文中说:

“诗是生活的儿子,缪斯只对那投身于生活激流的人微笑,如同从事其他事业需要相应的才能一样,写诗也需要诗才,即对生活中的诗美的感受力与表现力。不过,在拥有生活积累与写诗才能的情况下,诗人的文化修养往往决定着他的创作水平。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文化修养也给诗人深入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写诗才能的发展以影响。”

诗人的诗美感受力和表现力是诗人艺术修养的中心内容。在这里,吕进先生论述了诗人的文化修养对诗人的创作的影响,并阐述了诗人的艺术修养、生活修养、文化修养等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一个诗人,这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常常合为一体,共时态地存在着,并规定诗人的创作实绩。因此,我试图从中国诗坛的实际出发,谈谈诗人的素质对诗坛现状和未来诗歌创作的影响。